

辉煌历程

革命星火点亮彝州山乡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在风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英勇的彝州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

解放，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用宝贵的生命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道路，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革命青年辈出 唤醒民众崛起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楚雄虽然地处边疆民族地区，但是，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一批外出求学的青年学子，开始学习接受先进的思想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革命运动之中，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外求学的楚雄籍进步学生最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通过书信和家访在家乡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活动和宣传活动，并逐步在楚雄地区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在爱国学生的呼吁下，楚雄各族各界人士纷纷投身到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爱国斗争之中。

赵祚传、张经辰、张帆、毕昌杰、姚宗贤、夏崇先、杨应华等一批在外地求学的楚雄籍青年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党员王德三、赵祚传等受党的派遣，回到云南成立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张经辰、毕昌杰也先后回到云南负责特委、临委工作。

保存在赵祚传故居的《农民四字经》复印件，《新青年》合订本六卷一至六号，是当时结合云南实际、启发广大贫苦农民觉悟、宣传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也见证了新思想在大姚七街一带的传播。

1927年5月，楚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武定特别支部成立，在武定、禄劝的学校师生中培养积极分子，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骨干，为开展工农运动做准备。中共武定特别支部的建立，犹如一颗火种，燃烧在千里彝山，唤醒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由此，楚雄地区开始进入了一个伟大革命的新时代。

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楚雄党小组在楚雄中学成立。1936年1月，在楚雄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楚雄支部。中共楚雄支部的成立，使党在楚雄地区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党的活动逐步深入。1938年12月，中共镇南师范党支部成立。由此，楚雄境内的党组织开始进入新的恢复发展阶段，相继建立了中共盐丰党支部、中共黑井党支部、中共镇南师范党支部……这些党小组、党支部的建立，有效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群众骨干，以抗日救国为旗帜，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和号召力，唤起各族人民群众，反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

红军长征过楚雄 留下深远影响

在红军长征元谋纪念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一幅幅生动的绘画作品、一份份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将大家带回到红军长征过程中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红军是工农兵！”“百姓兄弟们，大家要共同抗日去！”在元谋县江边乡江边村和龙街村在龙街渡口的墙壁下，红军长征过楚雄时的革命标语依然保存完好；红军在楚雄地区行军作战中书写的革命标语如今依然清晰可见。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及第二、六军团于1935年5月和1936年4月，先后两次经过楚雄地区武定、禄丰、南华等8个县共1000多个村庄，历时18天，行程1300多公里。红军长征过楚雄期间，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为各族群众指明了争取自由、谋求解放的道路。红军所到之处，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受害群众；开仓放粮，分给贫苦人民。楚雄各族群众不惧风险救治红军伤员，500余名彝州青年跟随红军继续长征，在长征途中和后来的战斗中，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红军长征过楚雄后，在彝州播下的火种从未熄灭。对楚雄和云南的革命斗

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和党组织在楚雄地区领导开展革命斗争取得了重要作用。楚雄各族人民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自觉投向人民的解放运动。

80多年过去了，红军的精神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元谋县每年都要举办红军节，颂扬红军的革命精神。

巩固革命政权 人民翻身解放

沐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楚雄市西山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了一批前来缅怀革命烈士的群众。革命烈士陈海、王金英纪念碑群，楚雄市革命老区暨“边纵八支队”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基地，基地里镌刻着559名英勇献身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姓名、年龄和籍贯的英烈墙，记录着革命先烈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的付出。

中国共产党在楚雄境内党组织的建立，翻开了楚雄地区革命斗争的新篇章。从1927年5月中共武定特别支部的成立，到1936年1月中共楚雄支部的建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18日，中共楚雄地委的成立，楚雄地区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云南起义，中共楚雄地方党组织接管各县国民党政权。滇西人



民自卫团于12月25日整编为“边纵”第八支队，整编后的楚雄人民革命武装以崭新的姿态参加民主建设，迎接南下解放大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楚雄各地建立人民政权，翻开了楚雄历史发展的新一页。

然而，1950年4月以后，由于征粮工作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楚雄地区顿时谣言四起，大地主恶霸等匪首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划指挥下，开始暗地活动，恶毒攻击党的征粮政策，煽动抗粮。楚雄各地先后发生29股反革命武装暴乱，这些土匪武装试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抢劫仓库，破坏交通路线，用残酷手段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楚雄、武定两个专区剿匪委员的统一领导下，楚雄分分区、武定分分区与部队协同作战，开展剿匪斗争。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楚雄成股的土匪全部被歼，大部分匪首落网。紧接着，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楚雄开展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清查并镇压了一批特务、匪首、恶霸等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这场艰难的对决中，楚雄县长陈海、哨区人民政府主席王金英及多名征粮工作队员、边纵革命军人壮烈牺牲，在楚雄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革命篇章。

本报记者 吕瑾

红色故事

“烈士英灵照我行”

“这是赵祚传烈士与革命军中同乡的合影。”“这是赵祚传烈士的遗照，他胸上的三个枪眼是国民党罪恶滔天的铁证。”86岁的张继荣老人用颤抖的双手翻开收集整理了近60年的赵祚传烈士纪念册，向青年学生讲述赵祚传烈士的革命事迹。

“烈士英灵照我行！”张继荣说，这是他收集、宣讲赵祚传烈士事迹的初心。

1962年，张继荣任大姚县七街区团委书记，听当地民众讲述赵祚传烈士的故事后，决心要把赵祚传烈士的事迹整理出来，让革命烈士的事迹发扬光大。然而，时隔33年，要清晰回顾烈士事迹非常困难。张继荣先后向全国各地发出调查信78封，翻遍了十几张照片，利用节假日跑遍了大姚七街、仓街、金碧、龙街等130多个村子和永仁、牟定、姚安等县，访问过160多个知情人，记录了14本笔记的资料，尽可能多地征集到了赵祚传烈士的资料。

“赵祚传虽然出身于殷实的家庭，但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真理，走上了解放人民的真正道路，在参与云南地下党领导工作中，他出生入死，3次被捕而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随着征集调查整理史料的深入，张继荣越来越感到责任的重大。

亲历者说

五封遗书成为传家宝

1928年，正当赵祚传准备携带典卖自家田产所得款项返回昆明时，被反动政府侦察到行踪，以“被通缉的要犯”为名将他逮捕。在得知赵祚传次日将被秘密处决的消息，同乡带上纸笔赶到狱中，让他在一夜之内写下了五封遗书，分别给父母、兄妹、岳父母、妻子和未周岁遗子。这五封遗书被赵祚传的家人珍藏到了现在，现留存于赵祚传故居。

赵祚传的孙女赵宏告诉记者：“每次重读祖父遗书，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大义凛然。”当她还是懵懂孩提的时候，看到写在宣纸上的秀气毛笔小楷的祖父遗书，不懂全部内容，只牢记祖父教诲；当她长成青年，重读祖父遗书时，祖父的话语字字敲打在心上，祖父为主义、为民众、为信仰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境界让她敬佩；当她步入中年，在各行各业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同时，重读祖父的遗书，更加体会到责任的重大，时刻



牢记祖父遗志，发愤图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在祖父的心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定不移，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责任不容辞。”赵宏说，正是对理想对事业的责任，让祖父动员全家人支持革命事业，变卖家里田地、妻子结婚首饰等，倾家所有作为革命活动经费。正是对理想对事业的责任，让祖父在即将走上刑场，面对死亡，大义凛然，坚信为牺牲生命的革命一定成功。如今，作为孙儿辈的她们也已步入中年，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作贡献，追随祖父的足迹，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祖父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遗产，但祖父的遗书是无价的，祖父的精神是永存的，祖父的遗书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祖父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赵宏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吕瑾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缅怀先烈 汲取前进力量



近日，在位于禄丰市安镇的张经辰烈士纪念馆，禄丰市政府办公室党支部25名党员干部，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重温入党誓词，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景仰和追思。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党员怀着崇敬之情走进张经辰烈士纪念馆，聆听烈士事迹，感受革命先烈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馆内大量历史图片和介绍，让大家感受到了灵魂的洗礼和升华，进一步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工作责任感。

党员王永刚说，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接受了一次特殊的思想教育，进行了一场革命精神的洗礼，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勇气、智慧和力量成就的百年，更是艰苦创业、筚路蓝缕和砥砺前行百年。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秉承先烈遗志，从党的光辉历程和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为推动楚雄州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用崭新

的面貌和优异的成绩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楚雄彝族自治州依托党史革命遗址和纪念馆等红色资源、红色基地，通过深入学习赵祚传、张经辰、张帆、毕昌杰等革命先烈的先进事迹，缅怀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并以党史学习教育、“革命烈士纪念日”等时间节点和主题党日等活动为契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生到张经辰烈士陵园等红色基地缅怀先烈、回顾历史，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全州10县市及州级各部门充分挖掘、运用全州110个党史革命遗址和纪念馆、36个党性党史教育基地，以及系列地方党史读物等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到烈士陵园、革命遗址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红色资源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只有把红色基因挖掘好、保护好和利用好，才能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效果。”楚雄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向阳表示。

本报记者 吕瑾

红色人物

张经辰：越是艰险越向前

张经辰，禄丰县安乡琅井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代理书记。

1917年，张经辰从琅井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投入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后，他在李大钊、王德三等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经辰一面读书，一面为党工作，他担任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及北大党支部书记，组织发动青年学生，参加一系列反封建爱国斗争，领导北大进步力量进行革命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经辰被党中央派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1929年春，经中央批准回国，到云南工作，被选为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张经辰回到云南时，党在云南的地下组织正处于危险境地。党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害，白色恐怖笼罩全省。鉴于张经辰回国不久没有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留在昆明，代理省委书记，继续领导地下斗争。面对险恶的处境和神差的使命，他毅然肩负重任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较量，负责编辑党的地下刊物《斗争》，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宣传发动群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30年夏，云南地下党遭到很大破坏，张经辰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



禄良县的三岔河、旧州、马街一带，对武装斗争作了部署安排，积极准备暴动。1930年9月，张经辰代表云南省委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考虑到当时云南的形势险恶，党组织要他不再回云南。但为了尽快将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他不避艰险于同年10月绕道九龙、香港回到云南。回云南不久因叛徒出卖，于11月不幸被捕。

入狱后，敌人多次军法会审，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丝毫动摇了张经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强信念。1930年12月31日，张经辰、王德三、李国柱、吴澄等被杀害于昆明西郊。牺牲时，张经辰年仅27岁。

本报记者 吕瑾 整理

赵祚传：置生命于度外

赵祚传，1903年出生于大姚县七街乡西村一书香门第家庭，是云南早期地下党领导人之一，60位为解放云南作出突出贡献人物之一。

1919年，赵祚传就读于昆明省立第一中学时，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云南学生爱国会”，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2年倡导组织“大姚旅省学生励志会”，创办了《大姚学生》会刊，针砭时弊，向恶势力宣战。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先后加入进步组织“云南青年努力会”和“新滇社”。1926年秋，赵祚传前往广州，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训练班学习，经政训班负责人王德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赵祚传回到云南开展工作，历任云南省特委委员、省临委委员、省特委书记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后，云南反动当局根据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清党”密令，逮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赵祚传在昆明启文街联络点参加会议时被捕。

“如果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被捕了，那就要抱着临难不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为党为人民献出青春和生命。”在狱中，赵祚传安之若素，毫不畏惧，置生命于度外，同难友们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六一四”政变发生后，胡若愚为了标榜开明，笼络人心，才将赵祚传等6人释放出狱。

7月，蒋介石派特使李宗璜到云南促使龙、胡联合亲蒋反共。赵祚传等组织青年学生走上昆明街头发表演说，揭露李宗璜来云南勾结反动派、镇压革命的阴谋，发动驱逐李宗璜的运动。



8月，赵祚传在启文街再次被捕，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赵祚传曾说服父亲将宜良县狗街的部分田产变卖，动员妻子把结婚时陪嫁的金手镯、金戒指等首饰当卖，将全部款项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1928年6月，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赵祚传从昆明步行回家乡大姚，说服父亲变卖田产，拟将全部款项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就在他准备返回昆明时，反动政府侦察到他的行踪，以“被通缉的要犯”为名将他逮捕。1929年3月29日黎明，赵祚传被反动政府杀害于大姚，牺牲时年仅26岁。

本报记者 吕瑾 整理